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1949禮讚》中的「中華」禮讚

Chinese Praise in The Salute of 1949

doi:10.6752/JCS.201603\_(22).0012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張崑將(Kun-Chiang Chang)

頁數/Page：234-2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2](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1949禮讚》中的「中華」禮讚 Chinese Praise in *The Salute of 1949*

張崑將\*

Chang, Kun-Chiang

### 一、所謂「禮讚」

「禮讚」，顧名思義，是一種在稱讚之餘，還要給予頂禮加以稱讚，可以說是稱讚中的稱讚。弔詭的是，「禮讚」一詞用在1949年這個歷史關鍵年代，有種既矛盾又統一的背反感，此中有真意，需要細細品味。

可以說《1949禮讚》(2015)的核心理念是「中華禮讚」，為免誤會，先說明這裡的「中華」特別指的是經過臺灣創造性轉換過的文化意義之「中華」。因此，本文所稱「中華禮讚」既指涉「納中華於臺灣」的「新臺灣」事實，也強調「臺灣／中華一體化」後產生「本臺灣開中華」的實踐動力。弔詭的是，如同書中提到中共與獨派人士都「否定中華民國」的立場（楊儒賓 2015：69），而「中華民國」竟成了兩岸可以溝通基礎的「一中」前提，堪稱「無用之大用」。這證明了「中華民國」存在的必要性，而它給臺灣所帶來的漢文化大傳統的論述，形成書中所說的「新漢華文化」，不僅形塑了「新臺灣人」，也在有意無意地以「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方式回流到中國大陸。<sup>1</sup>質言之，離開了「中華」，無法談臺灣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也無法談本

---

\* 張崑將，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電子信箱：kungiang25@gmail.com

1 所謂「逆中心互動傳播」係江燦騰教授在其編著《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臺北：五南圖書，2011）一書所提煉的詮釋方法論。此書所謂的「雙源匯流」，係以1949年為關鍵分割點，前此係指明清時代由大陸傳入臺灣後，已逐漸在地化的「中華漢傳佛教」舊源流，以及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大舉跨海逃難到臺灣發展的「中華漢傳佛教」的一股大陸新源流。以上兩股新舊源流在1949年後相互匯流和不斷辯證發展，逐漸構成戰後迄今臺灣本土「中華漢傳佛教」的新主體，而這個經過在地化轉型的「新中華漢傳佛教」，正逐漸以其邊陲的「逆中心互動傳播」之方式，注入與影響大陸中心的漢傳佛教之性

書的核心理念，在此不得不「禮讚中華」。

對熱愛「中華」的人而言，「中華民國」是天上掉下來給臺灣的「禮物」，臺灣應該感激涕零。但從獨派人士觀點而言，「中華民國」道道地地是個「外來政權」帶給臺灣的「強迫的贈品」，處處壓迫著臺灣。歷史的發展有偶然，更有必然，更明白地說，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無論是「禮物」或是「強迫的贈品」，從歷史長河來看，中華民國建立之際，並不包含臺灣，但今日這個「中華民國—臺灣」一體化，融合了舊臺灣與中華民國，並注定以這樣的姿態面對未來兩岸與國際的歷史脈動。《1949禮讚》正視這樣的歷史事實，且以宏觀的大格局視野對1949蓄積的能量重新評估，早已超越上述兩個正反極端的觀點。

面對1949，一般人都說那是災害苦難的一段歷史，但作者要昇華那段災難的記憶，化「歷史災難」為「歷史機會」，轉化「災難」或「悲劇」成為新生或救贖的動力，要以同體大悲的襟懷消化流離苦難，要將1949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號。面對那個年代的政治與文化壓迫，作者看到的是「受難者的劫難可以轉為禮物，使得原初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同時獲得救贖」(48)。面對那段當代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者鬧得不可開交、無可調和的年代，當臺灣還有諸多對儒家早已不屑一顧的自由主義信徒者，作者卻從這段爭議看到上述兩股理念在臺灣成為調融的文化現象。當本土意識愈來愈高漲，儒家文化在當代政權的文化政策中變成可有可無情況下，作者從當代新儒家徐復觀身上看到了「島內儒家傳統與大陸的儒家傳統完成了整合」(199)。總之，作者企圖賦予1949多元與多層面的視角，超越僅停留於單方面的政治或族群壓迫的訴求，因為他擔心：「1949年這麼激烈的變動，它的意義一定是多面目的，如果我們看待1949永遠帶著史明的眼光，或者只從經濟崩潰、族群壓迫的角度著眼，1949的意義會被壓扁成平面玻璃般的透明，深度沒有了，再生的力量減弱了，更糟的是一種苦難與創生的辯證力道消失了。最糟的是：化力量為悲憤，化悲憤為耽溺，我們就在無窮後退的抱怨聲中，掏空了自己存在的根基」(54-55)。

如此將「苦難」、「災難」轉成「救贖」、「再生」的力量，從「黑暗」中透視到未來「光明」的意義，把「被強迫的贈品」化為「禮物」，

---

格。筆者認為這個「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提法，也適用於《1949禮讚》這本書所探討的「中華」性格。

視黃土文化與海洋文化可以接榫而不必然對立，從一個廣袤的文化或文明視角，衡量這個1949所帶來的天搖地動之震撼，而不停格於悲劇的原點，我覺得這是「禮讚」之所以為「禮讚」的深意或本意。但要論這個「中華禮讚」，也許將之放大到東亞歷史視野來看，會更凸顯「中華」意識的複雜糾葛情節及其時代意義。

## 二、從東亞的「中華情節」到臺灣的「中華禮讚」

過去清朝的士大夫與朝鮮使臣互相筆談時，曾經感嘆過「中華在朝鮮」。海峽兩岸開始交流時，我們也常聽到大陸人感嘆「中華在臺灣」。「中華」在過去不是只有中國周邊民族渴望，中國內地也極度嚮往著。換言之，將「中華」或「中國」這個情節放到東亞歷史視野來看，其實是東亞區域的共有課題。

由於中華帝國的早熟性，「中華」的緊箍咒早在古代就已經發酵，特別是在17世紀明清鼎革之際，更在東亞世界的韓國、日本、越南產生陣陣的波浪。質言之，「中華」意識之所以成為東亞文化共通課題，起因於大中國遭逢巨變。每一次中國的劇變，都出現大量的移民潮，牽動的不是中國內部問題，更是東亞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特別是17世紀明清鼎革之際，因「華」已「不華」，所以出現東亞的朝鮮、日本德川、越南出現「搶華」或「爭華」的意識。

朝鮮與越南這兩個國家由於最接近中國，也因中華帝國的早熟性，又發展出天下中心體制，周邊國家以中國為中心，故從地理位置來說，朝鮮自稱「東國」，越南自稱「南國」，兩國都有深刻的中華淵源，而且都來源於中原戰亂後衍生的一波波難民潮，與1949年很類似。不論現今韓國人承不承認，公元前12世紀，箕子帶領商人遺民至朝鮮半島北部所建立的箕子朝鮮，曾經是朝鮮王朝五百多年來中華情感的源頭之一。越南的開國神話則一律追溯自中國神農之後，成為百粵之祖的雄王。從文化主體性的角度而言，朝鮮與越南這種中華情節的攀附，如果僅以不甘位居「夷狄」而自稱「中華」而言，也許只對了一半，另一半的理由更可以是作為爭「正統中華」的資本，亦即華可以自華，來源可以是出自地理的中國，但因中國王朝常有「夷狄入中國」的王朝，故周邊國家依然可以「自華而華」，與中華平等而立。

毫無疑問，擁抱「中華」最親密的是朝鮮王朝，在滿清入關以後，甚至發展出從「小中華」到「大中華」或「唯我是華」的意識。<sup>2</sup>其次應該是越南，越南的中華觀比起朝鮮更為大膽，從11世紀以後，越南陳氏王朝在宋元之際與中國交鋒時，越南的史書文獻中常稱自己是「中國」，「各帝其帝，各華其華」的南國獨立思維很早就建立，而這些中華／中國意識，都與中原地區戰亂產生大批的南下遺民有關。<sup>3</sup>再其次是日本，雖然日本最終發展出脫逸的中華觀，但它的起源與過程依然很「中華」。日本最早的兩本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已是8世紀的唐朝初期作品，但寫的都是漢字，《日本書紀·神代卷》，一開始有關天地開闢之說，引用的還是出自中國《淮南子》，很難排除這段神話與中國大量移民潮落居日本有關。到了從德川初期出現山鹿素行(1622-1685)《中朝事實》以「中朝」（即「中華」）為日本，表達「日本本身就是中華」，到德川中期發展成「彼此各華其華」，而到了明治維新的甲午戰後成了「看不起中華的支那論」，乃至1937年侵略中國時喊出「暴支膺懲」論。質言之，中華論在日本短短三百多年的發展中，日本從一個要與「中華」互競，到「看不起」中華，最後發展出「暴支膺懲」，想要取華代之、成為東亞中心。這與朝鮮與越南的中華論發展很不同，特別是朝鮮。朝鮮在滿清入關後，本身也認為「自華中心」，但並沒有要取華代之，尚且期待中華重光，回到「天下」格局的中華，我要強調的是，朝鮮這種與中華論斬不斷的情節或情感是接近臺灣的。

近代以前的朝鮮人也有過與臺灣人類似的「中華」困惑，之所以困惑，乃因「夷狄入中國而中國之」的歷史大變局，不只是中華帝國政治王朝的更迭，衝擊更甚的是中華文化的改易。1644年滿清入關，在此之前1636年的「丙子胡亂」，朝鮮國王被迫稱清為帝，當時朝鮮士大夫「義不帝秦」者自殺有之，辭官有之，主北伐者有之，寧亡國抵抗者有之，為的是「華已不華」，既然華已不華，北伐又無望，朝鮮就撐起自己是華的正統，於是過去只是「小中華」，如今慨然有「大中華」之志。

讓臺灣走向有中華意味的國際歷史舞臺是三波移民潮，第一波是1661年明鄭帶來了龐大的漢人移墾臺灣，第二波是1895年的乙未割臺事件，臺灣人在殖民統治下開始產生祖國意識的中華情懷。但這兩波相較於1949前後的巨

2 可參張崑將(2013: 183-205)。

3 相關研究可參張崑將(2015: 167-191)。

浪，僅可說是小川流，對大中國而言，這兩波也只能是邊陲性質。可以說，真正以中華之姿搬上國際舞臺，且一度成爲中華中心的是在1949年。1949年中共建國，由於高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治國，拋棄自己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被迫「花果飄零」到臺灣來，蔣介石政權在臺灣成爲「中華正統」的捍衛者，一時間「邊陲」的臺灣，忽然成爲「中華中心」。隨蔣氏政權到臺灣的兩百多萬大量軍民，突然使臺灣成爲「最華」的田橫之島，臺灣開始擁有國家級體制、國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國史館、國家圖書館，並且在日常生活上處處可見的中華街道名稱、以儒家命名的街名、各地飲食、各省語音雜揉、繁體字的使用……，無一不是大中華的濃縮體現。

江燦騰教授曾在其《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2011)一書中這樣說，1949年的「難民潮總體規模之龐大和彼等在其後所造成的實質整體影響之深遠，縱使將明鄭三代在臺經營與清代二百多年間漢人多次相繼東渡來臺的總人口合計，也未必能夠與之相比。」(2011: 96) 這股龐大的難民潮，是注入臺灣文化作爲「逆中心互動傳播」的最大波動的起源，同時也是「臺灣」與「中華」進行前所未有大規模暴風式的衝擊與融合的過程，形成「新臺灣」與「新中華」的辯證關係，這層變動的開始，中華（無論文化上或政治上的中華）一開始是主動的主體，臺灣是被動的客體，但發展迄今，「中華」已納入「臺灣」成爲「新中華」，臺灣已不再只是客體，而是以「新中華」的主體身分，用「逆中心的互動傳播」方式回流到改革開放的中國，中國也以正在蛻變中的中國，試圖拉住「新中華」的臺灣。這就是《1949禮讚》最關懷的核心課題，姑且稱之爲「中華禮讚」。

作者書中有一段話表達了「禮讚中華」的觀點：「它(1949)在文化上意義上扮演結合連接器、變壓器於一身的總樞紐的角色，它借著東亞史上極罕見的大規模文化人力與文化財力之由大陸引進島嶼，打通了前近代（清朝）、準近代（日治）與戰後現代、後現代之兩條歷史階段管道，它引爆了潛存的漢文化之動能，並以『中華民國』的形式，朗現了四百年人文社群精神外透的樣式。」（楊儒賓 2015: 99）換言之，從1949大規模黨政軍及文化力量注入臺灣的那一刻起，「臺灣」不再是「舊臺灣」，「中華」也不再是「舊中華」，以後的發展證明臺灣常處於「傳統／現代」，「統一／獨立」，「本土／國際」，「在地／中國」之間輾轉擺盪，形塑了多元主體的「中華—臺灣」一體化的融合體。1949這股巨大浪流，徹底改造了臺灣，帶給臺灣前所

未有實體「國家」與經濟規模，將濃縮的中國移轉到臺灣，使得臺灣從「邊陲」一下子昇華到「中心」的地位。

但這樣的「中華」讓臺灣的國家主體性提前早熟，自解嚴後這樣的「中華」愈趨分裂，使它同時具有隱顯兩性格。「顯性中華」是拿來對外的實際外交與經貿關係，爲了凸顯國格而用的。「隱性中華」是指「獨臺」或「臺獨」，都可以刻意遮隱甚至不要「中華」，爲的是強化臺灣本土的主體性。不過，無論肯定中華或是否定中華，也不管是顯性中華或是隱性中華，理想主義者或是現實主義者，臺灣人都繞不開「中華」，即便它的國名將來不是「中華民國」，「中華」也不會成爲幽魂，依然會具體存在，因它除了潛藏於文化時間上之DNA，還實質地存在於地理空間距離上無法擺脫巨大的中國之存在感，過去朝鮮半島都已是如此，臺灣豈能例外。正因如此，才必須「正視」這個中華，甚至「禮讚」這個中華，讓它發揮應有的功能，將它創造性的轉化，成爲創造力的泉源。

### 三、「本臺灣以開中華」的新詮釋方法論

爲何《1949禮讚》中的核心理念是「中華禮讚」，如果拔掉了「中華」或「中國」這個文化或政治的概念，「禮讚」就不再是「禮讚」了，如同把孔子《論語》中的核心思想「仁」拿掉，孔子學說就不再是孔子學說了一樣。我爲何這樣說，1949年大量的移民來自中國，徹底改變了過去僅作爲「邊陲」臺灣的性質，書中多章探討這樣的「納中國於臺灣」的中華情節。同時，書中也有大量的課題是有關儒家與現代民主，這當然與「中華」情節緊密相連，諸如大陸儒家與臺灣儒家，寧可歸骨「中華民國」的唐君毅，〈1949與兩岸儒學〉、〈在臺儒家與渡臺儒家〉，在鹿港舉辦的「在臺灣談中華文化」論壇，還有論〈臺灣的創造力與中華文化夢〉，即便〈在民國思考「民國學術」〉、〈兩岸三地：新中國與新臺灣〉等，談的都與「中華」課題離不開。

老實說，這本書讓激烈的本土派看了會很不爽，而激進的中華意識派讀了也升不起「禮讚」，特別是將能久親王與鄭成功並列的那一章，已經超出他們忍受的尺度。但作者顯然不在意這些毀譽，書中將時空拉到廣袤的視野，不落入單一時間或單一空間，也不沉浸在悲情與壓迫，更不落入民族與國家的框架，寧可從東亞史與世界史的視野，展現其大格局、大胸襟之恢宏

氣度，積極思考1949所蓄積的巨大文化能量。筆者淺學非才，在此揣測並闡釋作者「本臺灣以開中華」的新詮釋方法論的企圖，庶幾能「不中」亦「不遠」。

作者相信，1949渡海此一「納中華於臺灣」之大事件，其影響之深之遠，超越抗戰西遷，而往上亦足以抗衡永嘉南遷、趙宋渡江這樣的格局(76)。作者也感嘆，1949的深遠意義還沒有被公允地挖掘或彰顯，此本書何以要「禮讚」的理由。1949迄今，臺灣與中國不斷蛻變，故作者也透漏「新中國」與「新港臺」的互動應該要有新的模式，也提出兩岸有必要的對話(63)。只是，這個對話新模式應該是甚麼？作者從當代新儒家常與「自由民主」苦鬥、吸收與融合中西的寶貴經驗，真誠地與西方民主自由對話，返本以開新，賦古義以新詮，既保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又融合了西方之長。無形中不僅成爲珍貴的臺灣文化資產，同時還可成爲對岸轉型的融通基礎。誠如作者在書中所說，1949年以後的臺灣，吸收了自由經濟、民主制度、文化樣式與生活方式，使得臺灣的生活世界「非東非西」、「亦東亦西」，就中華而言，臺灣還發展出「比中國還中國」、「也比非中國還非中國的新華人文化面貌」(36)，這個「中華」，透過作者參與臺灣民間鹿港文史工作室所舉辦的「在臺灣談中華文化」活動後，感覺它「會愈來愈本土，同時也會愈來愈國際」(151)。也許我可以再補充，套用龍樹菩薩《中論》所說，「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的用法，這樣的「中華」具有是一種「非本土，非非本土；非中國非非中國」的辯證性昇進關係，它的創造力及思考力即在於此。這樣的中華，不是應該被「禮讚」嘛？歷史上有哪一個像這樣的「中華」面貌，經過六十多年，它輾轉完成了自古以來中國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體制（即使現今的發展不那麼令人滿意），透過「納中國於臺灣」的方式，先在新臺灣進行創造性轉換的成功實驗，並「本臺灣以開中華」的方式，逆中心地回流到中國大陸，扮演著刺激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

其次，這樣的「中華」該被「禮讚」的理由，是超越民族國家的框限，既走出左派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激情，也放下了臺灣民族主義的悲憤，彷彿回到「天下」格局的「文化中華」，呼籲用「仁德」的包容力量，拋開政治對立，化苦難爲創生，轉悲劇爲救贖，完成了革命派孫文乃至維新派梁啟超當年無法超越的「民族國家」限制。再者，這樣的「中華」之所以要被「禮讚」，是將「中華中心」的陸地性格，帶到一個具有海洋性格且懷有「東亞性格」的多元臺灣。前此的中華難有「東亞視野」，當它融入了臺灣後，成



為海陸交會，東亞薈萃。

透過以上「中華禮讚」的分析，固然不必將本書格局縮限於臺灣視角，也不必侷侷於大陸觀點，1949既然是大時代下的產物，就讓它回到應有的大時代脈絡下之格局，始能見其大，才能窺其真。《1949禮讚》提供我們的新詮釋視野及方法，就筆者淺見，既可以「納中華於臺灣」，也可以「本臺灣以開中華」，前者是針對1949以後臺灣發展的現況，作者各章都呈現這個事實。但作者不會滿足這樣的歷史與文化事實之爬梳，似有更大的企圖，書中論當代新儒家引用過「返本開新」的概念，筆者借用這個概念，深覺作者此書在陳述「納中華於臺灣」的歷史文化事實之餘，還更想重新開出「中華」的新意義與新創造，這樣的「本臺灣以開中華」之思路與企圖，可以說貫穿整部書。故我稱「本臺灣以開中華」，它既是一種期待的態度，更是一種研究的新詮釋方法。

## 引用書目

- 張崑將。2013。〈朝鮮儒者「小中華」意識中的自我情感因素〉，《國際版儒教文化研究》第二十輯，頁183-205。
- 。2015。〈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十二卷第一期，頁167-191。
- 江燦騰。2011。《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從雙源匯流到逆中心互動傳播的開展歷程》。臺北：五南。
- 楊儒賓。2015。《1949禮讚》。臺北：聯經。